

七十年与四十年

(一) 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连续了 70 年，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到现在又过去了 40 多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所外共 10 余位同志经过几年的通力合作，撰写出了这部《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书上环绕近代中日两国关系中日本的侵略与中国的反侵略斗争，系统叙述了日本侵华的全部过程；阐述了各次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大量史实经过考核，基本论点确然不可移易。它是近年来国内中外关系研究的一项新成果。看题目，很容易联想到 50 多年前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在内容上两书各具特点，王书不可能摆脱旧中国的环境条件，在认识和资料上打的是前面 70 年的印记；现在这部书写作于新中国，反映的是后面 40 年的情况和认识。

(二) 前面的 70 年让我们想到的事情是很多的。世界上一些国家或民族，当遭到严重失败、处境屈辱痛苦的时期，总是一面接受现实生活的严酷考验，一面回顾历史，

* 这是为《日本侵华七十年史》撰写的序言。

要求众人铭记他们祖先的业绩，思考过去，创造未来。例如1806年普鲁士败于拿破仑，普法订立和约，普国丧失领土二分之一，柏林被置于法国军队的控制下。大约1808年，普鲁士哲学家费希特写出《告德意志国民》一书，眼望遭受践踏的国土，讲述日尔曼人的历史，呼吁德意志人恢复自己的本色。过了半个世纪，普鲁士又一跃而起。19世纪末叶至本世纪中，日本在亚洲像彗星横扫空际，逞霸东方。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人民的顽强战斗，这个庞然大物遭受致命打击，又一下子黯然坠落下来。国土被美军占领，民族一度丧失独立，人民陷人物资匮乏，精神十分痛苦。日本国内关于这场战争的著述很快纷纷问世，1953年出版的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著者强调说，日本遭到空前惨败，国家民族的前途令人惶惑不安。如果在旧时代，大家会期待伟大的哲人、政治家、科学家出世。可是那并不足凭借。当今每一个国民都必须成为爱国忧国之士，自己来正确考虑和确定国家的方向，并为此集结一切力量。“新日本的兴亡安危，将系于此”。时间过去三四十年以后，日本又蹶而复起。德国、日本各有自己的特殊性。倘若认为它们遭受失败，很快又复兴起来，就是因为总结历史，牢记了国家民族的屈辱，那未免太片面了。但费希特著作、服部战史所体现的顽强奋发精神，其作用确实是不可轻视的。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整个篇章翻过去40多年了，为什么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系统研究，拖

了又拖，迟之又久，到今天才作出了现有规模的清理？回顾一下，主要原因恐怕是在中国大环境的特点里头。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是胜利者。中国又紧接着取得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然后大踏步跨进了社会主义。新制度代替旧制度，整个意识形态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新的问题要去研究、辩论。这一些，无疑地直接间接影响到我们及时、系统、全面地研究日本和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那段黑压压、沉甸甸的灾难的过去。个别项目如《帝国主义侵华史》刚刚做出一些成绩也因受到阻挠而延搁下来。时间过去越久，在人们的心目中就越发觉得事过境迁，那些历史陈账简直没有多少意义了。雅乐不昌，郑声大扬；正理睡觉，歪理咆哮。前一个时期，照一些人看来，说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内容是外国侵略、封建压迫与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那是捕风捉影，无稽之谈；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是做了件大好事；没有它，今天的中国不知是个什么样子；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不抗比抗为好，抗日多余了；今天讲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不合时宜，妨害解放思想，等等。虽然这种极端的混乱颠倒只出自少数人，但对思想界学术界提出来的问题是相当突出，需要深思的。

究竟应当怎样认识、对待旧中国那段历史？事实是，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和中国整个民主革命取得了光荣胜利，外国侵略留下的民族耻辱，造成的中国社会灾难与落后，并没有也不可能自行抵消，不复存在。昨天严

重压抑、损害中国的外部势力，有的今天又想卷土重来，像幽灵一样在中国的某些地方晃荡踟蹰，伺机而动。我们健忘或者重视与否，将决定它们存在时间的短长。因为凡过去了的事情就不必问闻了，那不是人类进入文明以来的规则。人们并非靠记住过去的种种来生活的，而必须靠克服现实矛盾来走进新的境界。但这只说明现在不会事事重复过去，而不表明现在事事都可以简单取消过去。历史研究者极力追求掌握各种记录细节，其中有职业的需要，有古董家的癖好。大多数人要知道的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主要是大纲节目，特别是其中的光荣业绩与耻辱记录。中国革命创造的光荣伟大业绩，没有人能够不予正视。一个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屹立在世界上，谁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但是，知道光荣伟大业绩了，是否就有理由有资格忘记近代历史的屈辱记录了，当然不是。有些人认为早就应当遗忘了，那他们遗忘的就不止是历史。前人说，“知耻近乎勇”。这个道理对个人，对群体都适合。忘记了与现实生活密切相连的近代历史上的民族耻辱，实际上是忘记了我们民族固有的坚忍本色、勇敢精神。历史的惩罚难免要落到他们头上。《日本侵华七十年史》部分地弥补了这个缺欠。历史研究的职责是要讲清楚以往发生的事实，绝对不需要也不可能加进或减少什么。讲清楚了这一些，就是把事情的本来面目还给了历史。中国人民的英勇气概、奋发图强有各种体现，牢记我们民族近代走过的艰难道路正是一种体现。日本政治家中曾根讲的一句话非常

警醒，照录于此，便于作个对照。其言曰：“在太平洋战争中受到伤害的国民的记忆，一百年也不会消失”。^①

（三）后面的40年里，旧的中日关系已经结束。日本的情况有显著变化了的，也有变化甚微的。军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梦魇继续盘踞在少数人的头脑中，没有变化。多次发生的历史教科书等问题是这样，近来某些人公开鼓吹日本重新称霸世界更是这样。1990年1月，日本一家月刊上登载的一篇题目叫做《90年代日本生存之路》的文章说：90年代将决定日本今后的生存道路，对日本来说是一个不亚于明治维新或战败那样的重要年代。“日本摆脱困境、谋求霸权的出路在于，确立输出日本文化。以往的历史证明，一个国家要谋求世界霸权，必须拥有军事、经济、金融和文化四个方面的优势。如今，日本已基本拥有经济、金融方面的优势，而且，只要日本愿意，谋求军事优势也不困难。因此，在上述四个要素中，对日本来说，关键是‘文化’。换言之即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一旦某种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在世界普及，成为世人所羡慕的文化，那它就具有不可估量的力量。总之，必须用某种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树立起令人羡慕的‘日本哲学’。这是90年代日本的重要课题”^②。照这位称为日本国际政治家的作者看来，日本现在不是要不要谋求世界霸权的问题，而是

① 中曾根与基辛格对谈。《读卖新闻》1990年1月1日至12日连载文。

② 舛添要一：《90年代日本生存之路》。《宝石》月刊1990年1月号。

如何实现称霸世界的问题。经济、军事等实力接近一应俱全或者不难俱全，剩下的就是输出日本文化，输出日本的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了。事情是如此严重，不解决，就要威胁日本今后生存之路。时间又是如此紧迫，解决的期限要确定在今年开始的本世纪最后10年间。话说得再明白再直截了当不过了。是的，发表这篇文章的刊物在日本报刊里面层次不高，文章作者也够不上某种权威，因此，这种言论好像没有多少代表性。然而事情不可以孤立地看待，“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侵略免责论”、“时效说”^①等洋洋乎不绝于耳。鼓吹日本重新称霸世界，不过是把前面的偏重于替历史辩护，改变成为今天的从现实地位出发提出主张了。它们喊出的是少数人的同一心声，人们没有理由漠视那少数人的能量。面对这种舆论鼓吹，《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的现实意义是很明显的。它叙述过去的事，却提醒人们不要以为过去的事就不会以某种形式重演了。历史运动有自己的规律：它总要迈步向前，又从来不是笔直地向前。一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你高兴还是不高兴。

关于输出日本文化，自然不能从“文化”这个词的表面价值去理解。世界文明史上，各个国家内部照例存在着

^① 长谷川庆太郎：《再见了亚洲》。1986年《文艺春秋》发售。书中指责说，现代社会是承认犯罪“时效”的。“时效”同样也适用于侵略战争。中国至今还在批判日本侵略，是没有“时效”观念，中国尚处在“根本不懂国际常识和现代社会原则的‘前现代社会’”云云。

阶级对立，从来不是统一的。各个民族的文化也照例存在着人民性的与只适合统治者需要的、先进的与落后的差异，从来也不是统一的。日本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日本文化中有丰富优秀的文化。论者把日本文化看做与军事、经济同等重要的称霸手段，并同明治维新时代直接联系起来，那究竟会是怎样的一种文化、怎样的价值观呢？看来这种文化、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是明白的：天皇制与皇国主义国家观念；明治“宸翰”宣布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对外扩张思想；哲学上的资产阶级国粹主义“日本主义”；再加上武士道精神的遗留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统治者制造的“神风”特攻队精神。这种要输出的文化，尽管涂饰了“最现代化”的藻彩，其实质，无非是明治时代以后日本统治者不断向外扩张侵略与军国主义结为一体的文化、价值观念。过去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中国和亚洲人民对此记忆犹新。他们理所当然地坚决反对日本再次推行霸权主义、军国主义，也坚决拒绝种种推行霸权主义、侵略扩张的思想文化。日本文化、日本哲学是很大的题目。日本学者和西方学者写过不少书，讨论什么是日本文化或哲学的问题。他们之中有论述精当的，如永田广志等人的著作；有一般被认为接触到了日本文化若干特点的，如班内迪克特的《菊花与刀》、克里斯托弗的《日

本心魂》^①等。对于日本文化中确实足以“令人羡慕”的带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学术思想，抱着科学态度的人应该像对待每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一样，仔细加以辨认，充分珍惜。但是决不能就因此掉转过去，以为日本输出文化与输出武化、军队“进人”别国不一样，就算太平无事了。霸权主义鼓吹者的看法与此正好相反。在这里，我们必须分清楚。是什么样的日本价值观念，什么样的“日本哲学”。

① 水田广志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著有《日本唯物论史》、《日本封建意识形态》、《日本哲学思想史》等书。《日本哲学思想史》初版于1938年，叙述到明治三十年为止，从中可以了解日本往后的思想、哲学是从何处演变来的。1967、1972年再出新版，著名哲学家松村一人在新版解说中有充分评价。露丝·班内迪克特是美国人类学家，《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1946年出版，中文本见浙江人民出版社《世界文化丛书》。书中许多分析引人入胜，西方至今称之为研究日本文化的经典著作。日本学者川岛武宜写的书评《评价与批判》深刻精彩，认识更高出于原书。罗伯特·C·克里斯托弗系美国记者、编辑，《日本心魂》1984年在英国出版，1985年中国对外翻译公司出中文本。其水平不足以与班书并论，在谈到日本知识分子、中国对日政策等时表现出强烈偏见，但资料较新，分析解说也有一些独到的地方。例如论及群体与个体的关系时说，“日本人对他们所从属的各个群体——国家、公司等，责任感远比大多数集体社会的公民来得强烈。这说明他们动力和效率的由来”。18世纪英国海军上将尼尔逊在一次海战关键时刻下达的命令是“英国希望人人克尽其责”。东乡平八郎在日俄战争对马海峡一役下的命令则是“民族与帝国的前途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的行动”。这两者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东乡命令的要求显然高得多。它表示出，在日本，每人对集体的义务没有止境。“在美国人看来，集体主义是一个消极因素，压制主动性，妨碍进步，但日本却活生生地证实了事情并非一定如此”，等等。

讨论中日关系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要看到中国、看到日本，也看到周围的世界。历史这条长河在浩浩荡荡前进中，到处充满着变幻不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正在发生又一次剧变。我们要明辨、掌握历史长河行进的方向，也要注视今天的剧变。